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9.05.003

# 史华慈毛泽东研究的创新特质<sup>①</sup>

刘中领<sup>1,2</sup>

(1.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210023;2.南京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江苏南京210029)

**摘要:**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为国外毛泽东研究开辟了新的学术视域和学术境界,充分显现了学术研究的创新性。这种创新性通过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实践价值和意义四个维度得以彰显,它不仅是史华慈对毛泽东研究的贡献标志,更为新时代开拓毛泽东研究提供了借鉴与启示。

**关键词:**“毛主义”;贡献;不足;评价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9)05-0019-07

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以“毛主义”战略研究为代表。史华慈“毛主义”的提出打破了国外毛泽东研究认识的惯性,从“毛主义”与马列主义相区别的视角给出了新诠释,把“毛主义”归结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这种创新特质在内容、方法、实践和精神四个向度把“毛主义”推向了“异端”。

关于史华慈毛泽东研究的创新性认识,国内学者王文涛、金红、袁玉梅等都给予了肯定。王文涛从学术意义上指出,史华慈的“毛主义”“在西方学术界首次提出并界定了‘毛主义’(Maoism)这一核心的分析范式,从而成为西方毛泽东研究从‘新闻传记’走向‘学术论证’的分界性标志”<sup>①</sup>。许可把史华慈将考据学方法、社会学与政治学和党史研究相结合、自然科学中的系统方法、比较研究法看作是中共党史研究做出的创新性贡献。解庆斌、由东剑等学者把史华慈的“人的模式”和“三角互动模式”看作是研究模式的创新。国外学者伊罗生(Harold R. Isaacs)1952年8月在《远东季刊》的第11卷第4期上发表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书评指出:“该书的主要价值在于,使许多现代中国历史的关键问题得以重新审视……他所发现的主要问题在于,毛泽东在中国获得权力的战略,不是来自莫斯科,而是毛自己在中国争取到的,其后也为莫斯科所认可。”<sup>②</sup>韦慕庭(C. Martin Wilbur)、欧文·拉

铁摩尔(Owen J. Lattimore)也对“毛主义”的创新性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些学者从不同视角,肯定了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的创新性。不过他们的这种认识主要集中在对“毛主义”的影响或模式上的认可。我认为仅有这些评价是不够的,还要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实践层面和精神价值四个维度加以全面解析和认识。

## 一 史华慈毛泽东研究的内容创新

### (一) 开创性的研究主题

二战结束后,美国的主流论调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是莫斯科“阴谋”的结果。这种认识在理论上把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和属性归结为与马列主义的一致性,即使两者之间有不同,也是毛泽东思想对马列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在费正清之前,国内外学者从来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在史华慈首次提出“毛主义”之后,美国的“右派”和“左派”不但不承认两者的区别,还对“毛主义”提出了批判,把“毛主义”提出的区别看成一种传说。在美国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风靡时,史华慈的“毛主义”研究更是冒着“天下之大不韪”的风险,提出并研究了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相区别的主题。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党与阶级的关系上,即中国革命是把农民作为革命的主力军和依靠力量,而传统马克思主义则把工人无产阶级视作革

① 收稿日期:2019-04-20

作者简介:刘中领(1979—),男,河南商丘人,博士生,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①王文涛:《“毛主义”话语的起源、性质与内涵》,《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②朱政惠:《史华慈学普》,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2页。

命的依靠力量。史华慈的研究主题开创了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新维度与新境界,开辟了新的学术研究路径。“史华慈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能够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出版,这不仅是因为它的主题直指中国的共产主义发展史,其中中共党史的内容占很大部分,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提出麦卡锡的追随者所不能接受的观点——中国不是克里姆林宫的传话筒。正因为此,这部著作在整个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弥足珍贵。”<sup>①</sup>

史华慈这个研究主题的创新性,一方面与20世纪初国外中国问题研究限于中国古汉语语言等相区别,与20世纪30、40年代斯特朗、斯诺、史沫莱特等新闻采访或人物传记形式也不同,具有了学术意义;另一方面它为打破当时美国对华封锁的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因为“毛主义”与马列主义的区别性,在理论上就否定了中国是莫斯科“阴谋”的错误认识。

### (二)从文化上进行思想溯源研究

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第一次提出“毛主义”研究主题之后,并没有停滞不前,而是进一步从“毛主义”的思想渊源的三个层面展开分析,即把“毛主义”的思想渊源归结为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思潮和马列主义。在这里史华慈虽然承认西方思潮和马列主义是“毛主义”的思想渊源,但他认为“毛主义”主要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自身文化的基因传承给了毛泽东,形成了“毛主义”。这也正是“毛主义”不同于马列主义的文化原因所在。沿着这一思想路径,史华慈逐步追溯“毛主义”的思想渊源,即从五四时期的自由民主思潮到《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五四时期的思想潮流开始于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从戊戌变法、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中国一直都在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这其中史华慈选取了严复作为代表,写出《寻求富强:严复与中国》专著进行研究中国近代的思想文化,对“毛主义”思想进行中国文化基因的剖析。按照中国文化思想的传承性,中国近代救国救民真理思想的探寻继续溯及到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在他的《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一书中,继续分析了中国古代具有代表性的儒家、道、法等文化思想的多样性。这种文化多样性的背后都有一种张力,那就是中

国古代传统思想的里一直都有探求怎样强国富民的思想。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这种思想所呈现在历史中的形式、内容和范围有所不同。这样“毛主义”思想就找寻到了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思想基因。这个文化基因就是中国从古至今的思想里都有一种独立自主和强国富民的精神。所以,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以《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为起点,不断进行思想谱系的追溯,为“毛主义”的独特性和创新性找到了思想文化的根基。正如学者金红所指出的,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是“从文化上对毛泽东思想寻根究底”<sup>②</sup>。

### (三)对毛泽东思想的“新”界定

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对毛泽东思想的内涵与外延给予了明确界定:(1)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不包括毛泽东晚年的一些错误思想。(2)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不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许多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都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史华慈所理解的“毛主义”思想显然在内涵和外延上是不同于《决议》。史华慈提出的“毛主义”指的就是毛泽东的思想,即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史华慈用《“毛主义”传说的传说》一文反驳魏特夫时指出:“《湖南报告》和秋收起义都代表着毛和其他人是‘毛主义’战略具体化的不同探索阶段。还有必要强调指出,所有我提到的有关‘毛主义’的策略都只是指1927年以后的时期。事实上,‘异端行动’一语与1933~1934年期间这些策略的充分发展有关,当时党几乎已完全与它的城市基础相隔绝。”<sup>③</sup>这是史华慈对“毛主义”早期所含内容的概括。他“把毛看作是革新家的主张已日趋增长。甚至这样的观点也提了出来,即认为毛后来诸如‘整风’、‘思想改造’、‘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公社理论等等的‘贡献’,的确比《新民主主义论》更明确地体现了同以前教义的明显背离”<sup>④</sup>。史华慈显然把延安时期、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毛泽东晚年时期的思想全部归入了“毛主义”的内涵和外延。实际上“在毛主

①赵勇,高子涵:《论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及其影响》,《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

②金红:《史华慈的毛泽东思想研究》,2014年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③萧延中:《“毛主义”传说的传说》,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258页。

④萧延中:《“毛主义”传说的传说》,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252页。

义”发展过程中,“‘毛主义’概念的指称范围不断扩大,从最初的指向主要依靠农民发动革命的战略到后来的‘整风’、‘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更多的是泛指毛泽东个人的全部思想”<sup>①</sup>。这里史华慈对毛泽东思想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扩大化的解析。史华慈对毛泽东思想的这种解析,就研究内容而言,的确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创新”。当然以《决议》为标准,我们是反对他这种主观扩大化解释的。

史华慈对毛泽东晚年思想进行了“新”解读。史华慈在《德姓统治:“文化大革命”中领袖与党史的宏观透视》和《卢梭在当代世界的回响》两篇文章中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新”阐释。史华慈把文化大革命思想与中国传统道德观念联系起来,“而卢梭关于道德与政治形式之间关系的论述与中国传统道德政治思想某些侧面之间的共鸣,或许比其他社会的传统道德更大。这种宽广、独特的比较视阈是值得中国学者深思的。”“史华慈在政治哲学的深度上,试图把现代社会的道德缺失、价值迷茫与毛泽东政治象征及其‘继续革命’理论的深层意图联系起来。”史华慈在《毛主席的秘密讲话:从百花运动到大跃进》中,“从文献的脉络中梳理出毛泽东晚年思想中体现出来的‘整体救赎’(Total Redemption)与‘全面挫折’(Utter Frustration)之间的复杂关系”<sup>②</sup>。由此可见,史华慈从社会发展需要道德的视角为毛泽东晚年思想注脚了文化道德因素,指出毛泽东想发挥道德因素在社会救赎中的作用以便推动社会发展,以此为基础把毛泽东晚年思想与卢梭道德社会思想相联系,寻求文化的通约性。在此,虽然承认史华慈的解读具有“创新”性,但我们是反对他的观点的。

## 二 史华慈毛泽东研究的方法创新

### (一)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相结合的方法

国内外的一些学者认为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使用了文献研究法,只是表述方法不同。国内学者赵勇、高子涵指出,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融入了原始文献研究等多种方法;许可在《史华慈与他

早期对中国共产主义的研究》一文中说,史华慈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中共一大到六大的决议宣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的讨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八七会议宣言》等,资料可谓详实丰富。罗伯特·C·诺斯(Robert C. North) 1952年2月在《远东季刊》的第21卷第3期上发表对《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评论时强调,“资料文献引证丰富”<sup>③</sup>。哈罗德·伊萨克斯曾在《远东季刊》的书评中评价“这部著作……应用了比迄今为止其他所有著作更为丰富的中文、俄文和日文资料”<sup>④</sup>。这说明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非常重视原始文献资料的收集和使用。恰恰就是史华慈对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与使用,不自觉地应用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

在第二次论战中,史华慈指出:“我从来没有否认过毛和马克思之间在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上的历史联系。”<sup>⑤</sup>那也就是说史华慈一方面突出强调了“毛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的不同或背离,但同时他也承认“毛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的联系。即“毛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只不过史华慈把“毛主义”与马列主义之间的不同当作分析的重点,以为自己研究目的服务。这种分析方法,如果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矛盾论的观点看,更是对两点论和重点论辩证统一关系的应用与诠释。

### (二) 问题意识研究法

国内学者王文涛指出,“在学术研究的方法和风格方面,史华慈提出了著名的‘问题意识’(lemaitques)命题,其核心语义是指人文研究领域不大可能给出某种绝对判断性的确切答案,在众多研究者的结论中,必然体现出‘富有成果之歧义性’(fruitful ambiguity)的张力。这是因为研究者所具有的视角,用史华慈常用的语言表达就是‘关切’(conern)、“议题”(issue)、“预设”(assumption)等,除了具体时代背景的复杂性以外,同时与研究者的自身的经历也不无关系”<sup>⑥</sup>。金红强调:“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注重带着预设的问题研究毛泽东的思想,从问题或预设的理想远景出发让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不同观点的思想家们

①尚庆飞:《国外毛泽东学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2页。

②王文涛:《“毛主义”话语的起源、性质与内涵》,《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③朱政惠:《史华慈学普》,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1页。

④Harold·R·Isaacs.“Review; untitled”,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1952, 11(4).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组:《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四次大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页。

⑥王文涛:《“毛主义”话语的起源、性质与内涵》,《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展开对话,带着问题意识考察毛泽东思想,史华慈的整个思想体系清晰又有条理。”<sup>①</sup>可见国内学者把史华慈的问题意识研究看成是其一种研究特色。

国外学者林同奇指出,问题意识是史华慈毛泽东研究的重要特色,所谓“‘关切’往往是指一种深刻的存在感受,有时近乎我们的‘忧患意识’。”“‘议题’指的是为了解决关切而引发的争论中的焦点,可有不同层次。”“‘预设’是指争论参与者都有自己立论的明言或未明言的理论前提。”“只有关切而无议题,不成其为学术,只是倾诉;只有议题而无关切,不成其为思想,只是戏论。”“‘关切’、‘议题’、‘预设’相互关联,构成史华慈所谓的‘问题意识’。”<sup>②</sup>林毓生则把史华慈的问题意识称之为“无法获得破解的问题”。由此可以看出,国外一些学者同样把“问题意识”视为史华慈的一种学术研究特点。

从国内外学者的论述来看,一些学者把史华慈的问题意识当作史华慈毛泽东研究的一个特色,我认为也可以把它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因为任何学术研究都必须以现实问题为切入点,以现实问题的解决为落脚点,也就是说学术研究必须面对真问题。所谓学术研究的真问题是学术研究所研究的问题必须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既然一般学术研究都要从真问题出发,那么史华慈的研究逻辑只是符合了一般的学术研究规范,而不能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特色。史华慈只是带着当时美国政府的现实需要,以一种新的视角剖析他国的毛泽东思想,为当时的美国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史华慈这种既具有创新解决国内现实问题、也具有国际视野的做法,倒是给后来者提供了一种借鉴和学习的研究方法。

### (三)“人的模式”和“三角互动模式”研究法

国内学者解庆宾说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使用了“人的模式”和“三角互动模式”。所谓“人的模式”就是史华慈把毛泽东看作一个人来研究;所谓“三角互动模式”就是人的有意识的生活由意识、处境和行动三者之间的三角互动交织而成的网络。“基于这种网络,史华慈‘毛泽东研究’的重点在于经由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教义这个参照系来考察毛泽东的意识活动。”<sup>③</sup>学者由东剑指

出:“史华慈在研究毛泽东政治哲学的过程中坚持‘人的模式’和‘三角互动’相结合的研究特点,使得其对中国党史研究与毛泽东政治哲学的研究显得更加饱满。”<sup>④</sup>显然,一些学者把史华慈的“人的模式”和“三角互动”模式视作史华慈毛泽东研究的新模式。

实际上,这是史华慈毛泽东研究的一种创新方法。史华慈在毛泽东研究过程中,是围绕毛泽东的思想意识、毛泽东面临的社会环境以及毛泽东的革命行动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展开的,这本身就是一种研究和写作方法。林同奇也认为:“人的意识、处境和行动之间的三角活动就成为史华慈研究政治史和思想史的一种根本方法,通过这个方法不仅使政治人物的行动成为可以理解的行动,而且展示了历史事态的发展并不像有些人事后回顾时说的那样只有一种可能。”<sup>⑤</sup>因此,“人的模式”和“三角互动模式”是史华慈的一种创新性的研究方法。

## 三 史华慈毛泽东研究的实践创新

### (一) 重视文献资料以及辨别文献资料的真伪

史华慈以其独特的视角、逻辑和方法所提出的“毛主义”战略,不仅使国外的毛泽东研究从新闻传记走向学术路径,而且引起了两次学术论战。论战对学术研究内容而言,为毛泽东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经验教训,启迪后来者需要不断探索新的研究维度。论战对研究方法来说,史华慈的文献研究法,为国内外深化毛泽东研究提供了大量详实的文献资料。从更深层意义上而言,研究者还要重视文献阅读和解析方法的客观性与多样性问题。因为一方面研究者由于受到政治条件、历史条件、语言条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所获得的材料本身的真实性与客观性值得商榷。另一方面,研究者本人由于受到自己的学术知识、研究专长、研究方法、学术立场和政治立场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同的研究者采用不同的阅读方法,得出的结论自然也是千差万别。因此,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在实践层面有助于推动毛泽东研究走向深入。

①金红:《史华慈的毛泽东思想研究》,2014年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②本杰明·I·史华慈著:《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中文版代序),陈玮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

③解庆宾:《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模式》,《北京党史》2012年第1期。

④由东剑:《史华慈的毛泽东政治哲学研究》,2014年大连理工大学硕士论文。

⑤本杰明·I·史华慈著:《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中文版代序),陈玮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页。

## (二) 培养毛泽东研究的人才

史华慈在做好毛泽东研究的同时,不忘人才队伍的培养。国内学者贾钢涛、欧晨在《论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一文中指出:“尤为海内外学者倍加钦佩和感怀的是,史华慈对培养、提携学术新人不遗余力,直到生前最后一段时间还在关心弟子的学术进展。”<sup>①</sup>不仅如此,史华慈对学生一视同仁,不时关心关注新人,鼓励学生大胆创新。在其做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负责人时,更是把办公室大门随时向学生开放,欢迎与他进行学术研讨。其学生李欧梵就把史华慈视为“为学与为人的楷模”<sup>②</sup>。在他的学生当中如:田浩、墨子刻、杜维明、李欧梵等等,后来都成为了中国问题和毛泽东研究的专家学者。由此可见,史华慈对新人的提携和培养,不仅在于传承其学术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更为国外毛泽东研究培养了大批人才,这些学者后来分别从不同视角和层面促进了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深入开展。因此,史华慈对毛泽东研究人才的培养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 (三) 服务于现实需要

二战结束后,谁为“丢失”中国负责的声音甚嚣尘上,当时的美国政府如何认识新中国以及如何理性处理与新中国的关系,成为了比较棘手也是当务之急的政治问题。当时的美国政府当局迫切需要政策咨询和理论依据。在这种背景下,史华慈在世界上第一次提出了“毛主义”战略,从“毛主义”与马列主义之间相互区别的角度,阐释了“毛主义”的内涵、特征、思想渊源等。在本质上,就是从“毛主义”具有“独创性”出发,史华慈批判了“莫斯科阴谋论”,提出了“毛主义”背离了马列主义的观点。因此,史华慈以此为理论原点和依据,指出美国当局不应该像对待苏联一样采取封锁与包围,而要承认新中国的合法地位,与新中国发展正常的外交关系。这就为美国当局提供了政策决策理论依据。

史华慈作为“美中关系委员会”的首批成员之一,与当时美国国会议员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及委员会主席(查尔斯·W·约斯特(Charles W·Yost)、新中国政策委员会等有过多次商讨中美关系问题的信件往来。他自己也撰写了《中美关系的新转折》《中美关系的进展》等文章阐述中美

关系问题。他还身体力行,积极开展相关的学术讲座与学术交流活动,1975年和1981年曾两次到中国进行访学交流。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和访学实践为中美关系健康发展注入了学者力量。

## 四 史华慈毛泽东研究的精神创新

### (一) 追求学术创新的责任担当精神

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不仅把国外毛泽东研究从新闻传记转向了学术研究,而且他的研究主题、方法、模式、逻辑,都彰显了一种学术创新精神,更重要的是这种创新精神伴随着一定的政治风险。这是因为:史华慈本来就是政治自由主义的信仰者,当他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著作创作与发表时,正是美国政府当局怀疑其遭到共产主义渗透之时,美国政府主流的声音是反共反社会主义,加上美国麦卡锡主义的风暴,在美国政界和学术界几乎人人谈之色变。在这种存在很大政治风险的情况下,史华慈依然根据自己掌握的文献资料,使用独特的研究模式和方法,提出了“毛主义”战略。由此而引起的两次学术大论战,遭到了来自“右派”和“新左派”的双重攻击,甚至因为否认“毛主义”与马列主义在本质上的一致性也遭到中国学者的否定。可是史华慈虽修正了自己的个别观点,在总体上依然坚持“毛主义”战略。正如他在《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的第三版序言中所说:“关于思想发展问题,我并不打算修改本书中的任何基本主张。自从这本书出版以来,许多人坚持认为列宁本人为共产党与它所设想的阶级基础——产业工人阶级完全分离的可能性打开了大门。然而,虽然列宁打开了大门,但是恰恰是毛泽东迫于中国的状况,实践了它。”<sup>③</sup>所以,史华慈在学术创新中不怕风险的精神彰显着学者的责任担当精神。

### (二) 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

有学者把立场分为理论立场和政治意识形态立场,“政治意识形态的立场影响着研究者的理论研究立场,理论研究者的研究立场往往是政治意识形态立场的反映”<sup>④</sup>。因此,史华慈的学术研究立场必然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立场的影响。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首先要为解决美国的现实问题服务,这本身就是史华慈鲜明学术立场与政治立场

<sup>①</sup>贾钢涛,欧晨:《论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sup>②</sup>李欧梵:《为学与为人的楷模》,《世界汉学》2003年第2期。

<sup>③</sup>本杰明·I·史华慈著:《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英文第三版序),陈玮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3页。

<sup>④</sup>尚庆飞:《国外毛泽东学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2页。

的表达。在此,我们虽然不能苛求史华慈毛泽东研究的学术立场与政治立场,可史华慈毛泽东研究的目的性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其学者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正如其师费正清所言:“哈佛对开展当代中国问题研究负有国家义务。”<sup>①</sup>但是,我们在承认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彰显了爱国主义精神的同时,也必须对史华慈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其局限性加以辩证分析,保持清醒认识。

### (三) 关爱人类的人文主义精神

史华慈的爱国精神没有止步于自己的国家层面,而是扩展到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担忧与关怀。中国学者朱政惠指出,史华慈的学术研究从中国学转向了人类关怀。西方学界普遍承认,“史华慈的中国问题的研究与他长期的人类关怀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有助于他深化和丰富对人类发展经验的认识;或者说,中国学是他对人类普遍关注的一个研究基地,他是从中国学出发研究人类的普遍关怀问题”。即使“在史华慈的认识体系中,中国学是他个人的人类文明比较研究的智库,是哈佛大学全球视野的基础,也是对‘全球主义’考察的重要的文化依据”<sup>②</sup>。因此,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不仅与史华慈对人类发展命运的担忧关系密切,而且为人类发展面临的问题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积累了研究经验。在进行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史华慈发现:“社会工程技术取向”向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先进技术,用“浮士德普罗米修斯精神”激发了人的潜力,人类社会的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但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征服,也给人类发展带来了贫富差距过大、道德缺失等社会问题。可史华慈坚信人类能够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全球主义’恰恰要求各种文化的理论尽可能地发展自己,同时交叉、互动出更普遍的意义来。历史不会因此终结,而是变得更复杂、更有意义了”<sup>③</sup>。于是,史华慈在《全球主义意识形态和比较文化研究》和《中国与当今千禧年——太阳底下的一桩新鲜事》等著作中,不断探索全球主义和人类发展的共同关切,希望通过“轴心文明”和文化比较研究探索人性的奥秘,寻找文化的共性与思想通约性,希望在卢梭的道德世界里发展人文主义。因为“我确信有一些跨越文化的、普

遍的人类关怀”<sup>④</sup>。其实,史华慈的人文主义就是一种人类普遍的道德关怀,即“把一切中心关切放在人世间及人的命运的思想”。“史华慈式的人文主义”是“对人生奥秘的沉思”、“理性精神和宗教情操的结合”<sup>⑤</sup>。因此,史华慈把对国家的热爱精神,发展到了对整个人类发展命运担忧的人文主义道德情操。这种精神不仅具有一定的学术启示价值,更代表了人类发展文明的道德诉求与归宿。

## 五 史华慈毛泽东研究创新性的认识与启示

### (一)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尤其是“毛主义”战略的提出,在研究视角、研究主题等方面都具有创新性。“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sup>⑥</sup>新时代的毛泽东研究也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回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践要求,不断深化与创新已有的毛泽东研究。这种拓展与创新研究需要借助于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成果。而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对毛泽东思想肖像的异域勾画恰恰给了我们一条新的思维路径,即不断从新的视域与层面,结合原始文献与现实问题的需要,探索毛泽东研究的新思路、新方法。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研究内容层面来说,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的资料都是起源于中国,但是史华慈却能从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相区别的角度,提炼出“毛主义”战略,从而为美国政府当局提供决策理论参考。这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可史华慈的研究主题与视角无疑具有开创性。从研究方法层面来看,比较研究法、文献研究法等方法是比较普遍的一种研究方法,不过史华慈却综合起来使用,并把对毛泽东个人的研究放在时代背景与实践层面进行考量,提出“三角互动模式”的研究方法。从精神层面讲,他更能把对国家的热爱之情升华到对人类发展命运的人文主义,这种责任担当与大爱精神已经远远超越了国界与学术本身。可见毛泽东研究是一个常研究常新的主题,关键是研究者能否发现毛泽东研究在新时代的真

①保罗·埃文斯著:《费正清看中国》,陈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5页。

②朱政惠:《史华慈学谱》,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7页。

③朱政惠:《史华慈学谱》,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1页。

④朱政惠:《史华慈学谱》,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5页。

⑤本杰明·I·史华慈著:《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中文版代序),陈玮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5-37页。

⑥习近平:《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2日(02版)。

问题、新问题。

### (二) 批判性地借鉴国内外毛泽东研究成果

在肯定史华慈对毛泽东研究做出了创新性贡献的同时,也要按照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一分为二地分析史华慈的研究成果。因为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一方面受到自身政治立场与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其学术研究立场难以完全实现客观中立。因此,在借鉴其研究成果时需要甄别、批判性继承与吸收。另一方面,就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的具体结论来看,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从论证内容上看,史华慈把毛泽东思想进行了扩大化的解释,并且“创造”性地将毛泽东“文革”时期的政治哲学思想概括为一种“德性统治”,这明显是一种主观认识与推断,这是我们所反对的。从论述方法来说,史华慈的论证充满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方法,但史华慈并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位自由主义的信仰者。因此,史华慈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应用是不自觉的。这种思想信仰与研究方法的二律背反也需要我们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加以甄别,辩证分析与借鉴。

### (三)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开拓毛泽东研究的新境界

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在内容、方法、实践以及精神层面都具有一定的创新性。这就启发我们的毛泽东研究也要在不同层面上开拓创新,架构毛泽东研究的新局面。但是如何“在全球化学术语境和‘毛泽东’这一世界性话语的研究背景下”<sup>①</sup>进行毛泽东研究的深耕细犁,“较之于当代国外毛泽东研究所呈现的异彩纷呈的学术图景,国内研究仍然存在着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一是研究对象部分存在着西方传统毛泽东研究中的‘一元中心化’倾向,具有进一步拓展与延伸的理论空间。二是研究的参照系存在单一性和抽象性的局限,需要进一步提升与优化”<sup>②</sup>。

另外,从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还具有其鲜明的政治立场与学术立场出发,国内毛泽东研究的深化与拓展,除关注毛泽东研究的时代背景、优化研究空间外,依然需要我们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基本立场与基本方法,反对任何形式的历史虚无主义。

## The Innov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Schwartz's Study of Mao Zedong

LIU Zhong-ling<sup>1,2</sup>

(1.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2. The First School of Clinical Medicine,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9, China)

**Abstract:** Schwartz's study of Mao Zedong has opened up a new academic vision and academic realm for Mao Zedong's study abroad, and fully demonstrated the innovation of academic researches. This innovation is manifested through four dimensions, i.e. research content, research method, practical value, and spiritual significance. It is the symbol of Schwartz's contribution to Mao Zedong's research, in addition it provides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developing Mao Zedong's research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Maoism”; contribution; deficiency; evaluate

(责任校对 王小飞)

<sup>①</sup>贾钢涛,欧晨:《论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sup>②</sup>张明:《当代国外毛泽东研究的“三重转向”及其学术意义》,《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12期。